

见证第三个十年

阿巴斯·杰瓦德·卡迪米(伊拉克)



作者简介:阿巴斯·杰瓦德·卡迪米,伊拉克籍,1987年毕业于巴格达大学文学系,1998年来到中国,曾被聘为新华社国际部外籍专家,后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阿拉伯语部工作,负责阿语翻译稿件的编审,并为恢复重建伊中友好协会发挥了积极作用。

常常听到一些喜欢中国的外国人这样说:“我是一个比中国人还要地道的中国人。”在这里,我不想这样讲,因为我更愿意将我的所感付诸于笔端,与大家分享。

1998年夏天,我从伊拉克来到北京,开始了全新的生活。10年间,中国带着无限的活力,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即使时光悠悠,人们也不会感到丝毫的倦怠。

由于从事新闻工作,我有机会结识了许多普通的中国人,从他们身上,从中国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建设中,我深切感受到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变。

生活在中国,我看到了中国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感受到中国领导层对于在人民中间公平分配改革开放成果的重视,特别是对于贫困农村的重视。

我到过中国的农村,在那里,农民们的辛勤耕作和幸福生活让我震撼。而最吸引我,最让我赞叹的还是那广阔的农田和那绵延不绝的绿色,因为它是它养育了地球上1/5的人口。不仅如此,中国在很多时候,还向许多国家提供粮食援助,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也看到中国正努力成为一个具有创新能力的国家。不仅许多企业正在大步走向世界,而且一些高新技术领域的成果也令世界钦羡,不久前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船的成功发射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我在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三个十年,这是我们一家与中国社会亲密接触相互融合的10年。1998年,我携全家来到北京时,3个孩子都还小,大女儿刚上小学。中国人的热情友好,让我们很快地融入他们中间。语言的差异没有成为沟通的障碍,微笑化解了所有难题。孩子们自己乘公共汽车去上学。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得到了那么多中国朋友的关心。多年之后,我的儿女都进入了中国一所著名大学深造。在中国,我们从没有陌生感。

当然,在中国的生活有乐也有苦,我们见证了中国在极为艰难时期的团结和力量。2003年,非典在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肆虐,中国也成为主要疫区。然而,中国人民以他们的努力和坚韧,最终取得了抗击非典的胜利,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扬。

我也见证了在中国面对自然灾害时的勇气与信心。2008年初,中国南方遭遇雨雪冰冻灾害,此后又发生了四川汶川大地震。但是每一次灾难的降临,都没有压垮中国人民,他们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排除万难,始终不放弃创造美好生活的努力。

10年中,我见证了中国的发展,目睹了街头、工厂、田间、学校的种种变化,也感受着社会建设方面的显著进步。

在改革开放历程中的第三个十年里,我亲历了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中华民族终于实现了百年梦想。

我有不止一个理由从心底里热爱这个国家,热爱这里的人民,这不仅仅因为它在我的祖国伊拉克最艰难的时期,以友爱和宽容的姿态包容了我和我的家人,更因为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友善、严谨和崇高的品格。

我生活在中国,为它经济发展的成就而高兴。然而,从内心来说,我更希望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发展也能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我热爱这里的人民,他们勤劳、善良。但是,我也注意到,仍然有一些瑕疵在他们的生活中存在。所以我对这里友好的人们寄予殷切的希望。我希望中国人民的整体素质能够得到更快的提高,特别是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让他们在享受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同时,不要丢弃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使之发扬光大。

我的脑海里有一幅美好的画面,它将保持到永远。我不会忘记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因为它也与我的三个孩子成长相伴,在我和孩子们的人生道路上,我们会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讲述中国这个神奇而古老的东方国度里的故事。我们会将这份属于我们和这个美丽国家之间的友谊,永远珍藏在心里。

(叶欣华译)



中国式古塔在欧洲

司徒一凡

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欧洲的许多园林中都有仿建的中国式亭台楼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仿照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宝塔而建的多座宝塔。由明成祖朱棣为纪念其生母袁妃而建的大报恩寺琉璃宝塔,虽然早在1856年就已毁于太平天国战火,但它的不少海外“亲戚”至今依然存世,继续以它们挺拔的身姿,见证着历史上中国园林与建筑艺术在欧洲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最早向欧洲完整地介绍大报恩寺琉璃宝塔的是荷兰人纽霍夫。他在17世纪中叶作为荷属东印度公司的随员到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回国后将所见所闻写成《中国图说》一书,于1658年在荷兰出版。他在书中特别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了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宝塔,使其在欧洲声名远播,被视为中国建筑的代表。但纽霍夫将9层的宝塔错画成10层,这一错误直接影响到后来欧洲以此为蓝本设计的许多塔楼的层数。欧洲第一座中国式塔于1762年在伦

敦西南部的丘园(现为英国皇家植物园)建成。这座八角形的砖塔共10层,高约50米,由英国宫廷建筑师威廉·钱伯斯设计。钱伯斯在1742至1744年间曾到过广州。他参观了当地岭南风格的园林和建筑,并将一些庙宇和宝塔用素描的形式准确地记录下来,回国后出版专著予以介绍。此塔是当时欧洲仿建得最准确的中国式建筑,塔身装饰彩色琉璃,五彩缤纷,曾在欧洲轰动一时,成为其后许多地方中国式塔的模仿对象。

英国皇家邮政曾于1990年发行一套4枚邮票,纪念丘园正式交由国家管理150周年。邮票图案由园中的不同植物和著名建筑物组成,其中面值37便士的“柏树与宝塔”1枚描绘的就是此塔,它也是集邮爱好者不可多得的表现中国题材的外国邮票。2003年,包括此塔在内的丘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在德国慕尼黑黑尔的“英国园”中,也有一座著名的“中国塔”。此塔仿照丘园塔设计,建造年代与上述塔楼时间相仿。塔高25米,共5层,12边形,木结构,每层均为全开敞的阁楼,外檐装饰镂空木格,空灵通透,出檐舒展。但在1944年7月的大轰炸中被烧毁,1952年按原样重建。现在塔周围是慕尼黑第二大啤酒园,看那三五成群的游人围坐塔下,畅饮着著名的慕尼黑啤酒,他们当中又有多少知道身边的这座塔与遥远的中国的多少渊源呢?

题图:创作于1763年的水彩画,描绘了英国伦敦丘园的中国塔。

雨伞——作为日常的防雨用具,在文化背景各异

的两个岛国英国和日本,却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内涵和韵味。

英国地处大西洋东侧,受海洋暖流影响,终年温润多雨。入春以后,雨就开始连绵不断。到夏天,雨水更多,且总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因此,人们出门,即使是晴天也带着伞,雨一来就撑起,雨一过就收起。

据说,英国人打伞始于17世纪。传说中伞的发明者是丹尼尔·笛福所著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主人公鲁滨逊·克鲁索。他因船只在大海失事而幸存,流落到荒岛上,用树枝叶制作了一个遮风挡雨的伞状物。到18世纪晚期,读过这部小说的人纷纷仿效。因此,英国最早的雨伞被人们称为“鲁滨逊之伞”。起始,打伞颇遭非议,认为“苍天降雨就是为了让人淋湿”,打伞是“藐视天意”。后来,打伞的人渐多,一些达官贵人仍不肯随俗,认为雨伞是穷人的遮蔽工具,乘马车才是高贵身份的象征。

到19世纪初,据说英国著名将领威灵顿公爵上战场时都打伞,而维多利亚女王则几次将装潢华贵的雨伞作为外交礼品赠人,同时也接受他人更加豪华的雨伞馈赠,雨伞由此在英国流行起来。

近代以来,一些英国男士总爱携带黑色长把伞。黑色代表庄重,长把则隐含风采。他们把伞或挎在左臂弯上,或倒提于右手之中。这手中伞,与其说是防雨,不如说是为了展示一种风度。这时的雨伞已失去了它原本的功能,而成为高贵的标识。在狄更斯、萨克雷、哈代等经典小说家的笔下,在《笨伯》等漫画杂志中,都不乏这样的人物形

象。久而久之,头戴礼帽、手执雨伞就成为英国绅士的传统装束和经典派头。

当然,任何传统都会随时代发展而有所变化。如今的英国人也在不自觉中赋予雨伞以新的人文情致。细雨霏霏中,伦敦泰晤士河畔或海德公园的草坪上,经常可以看到少男少女们偎依着,相拥在一顶雨伞下,或喁喁情话,或接吻拥吻……如果说雨伞过去是用来装点或衬托某些人的绅士风度,而今则成为许多人宣泄浪漫情怀的工具。

雨伞下的人文情致

高秋福

同英国相比,雨伞在日本则大相异趣。地处太平洋西侧的日本,每年6月进入梅雨季节。由细雨连绵到瓢泼大雨,一般会延续四五月之久。这样,雨伞就成为日本人日常生活的必备之物。

日本人使用雨伞完全从需要出发。那些来去匆匆的上班族,无论男女,经常是将雨伞提在手中,或夹在腋下。无论走到哪里,大小商店都有雨伞出售。二三百日元一把,对月薪至少二三十万日元的日本人来说,就好像国人随手买根冰棍。在旅馆,旅客出门可随时从服务台借用雨伞,往往是比较简易的塑料雨伞,借出去就不期



望归还。日本人很少将湿淋淋的雨伞携入室内。这不是什么规定,而是人们为了清洁长期养成的习惯。在几乎所有机构的大门口,常年摆放着一两个木箱或铁桶。人们上班时把雨伞扔到里面,长把露在外边,下班时无需分辨,随手抄一把就走。而在商店门口,最常见的是放置一个或几个木架,架上有带锁的孔洞。顾客进门后把雨伞往孔洞内一插,钥匙一转就上锁了。离开时,顾客开锁取走自己的雨伞,钥匙自动留在锁孔中。有时发现顾客留下的雨伞几日不取,店主就在伞架子上贴一告示:5日内不取,店家就自行处理。有的商店在门口摆放着打套机和放套桶。顾客入店,将雨伞往机器中一插,雨伞就自动裹上一个塑料套。这样,顾客就可以携带雨伞入店。离店时,如无须打伞可把套子与雨伞一起带走,如仍下雨,退下的套子可弃置桶中,防止造成白色污染。

日本人做事细致认真,一把小小雨伞的使用竟有如此多的讲究就是明证。日本的基础科学很发达,实用科技也很发达。一项基础研究成果出来,就迅速转化为实用技术,转化为产品,推向市场。这体现在电器的研制、汽车新型号的开发、新干线电气列车的运行等大项目上,也体现在像雨伞这样一件小小的生活用具上。

仔细想来,看似不起眼的雨伞,在英日两国却有如此大的差异,英国人看重其装饰性,尽力用来展现人的精神气质;日本人则讲究实用性,极力开掘其优质生活的功能。

的黎波里——“沙漠中的旅游城”



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地处撒哈拉沙漠北部边缘,是地中海南岸的一片绿洲,市区树木繁茂,花草竞生,气候宜人,因此被誉为“沙漠中的旅游城”。

的黎波里是一座拥有2700多年历史的古城。公元前7世纪,腓尼基人在北非地中海沿岸建起3座城市,统称“的黎波里斯”,意为“三市”。后来其中两市在公元365年毁于大地震,唯有居中的奥耶市独存,历经沧桑,发展成为今天的的黎波里。

的黎波里曾被罗马人占领达600年之久,但至今一直保持着浓厚的阿拉伯传统风格,其旧城区被称为“红堡”,靠近该国最大的港口。城内古色古香的街道、繁华喧嚣的集市、精雕细刻的古寺,呈现出典型的阿拉伯古城风貌,令人流连忘返。

王芳 廖政军 焦翔文/图

透过市中心一处街边咖啡馆的拱形门,可望见利比亚最著名的经学院。



坐落于地中海海滨的利比亚最大的国家博物馆——“红堡”博物馆。



位于旧城区的阿拉伯集市里最具民族风格的一家手工艺品店。

城市的自信

流沙

艾格是澳大利亚的一位室外墙体绘画艺术家,在巴黎住了10年,虽然他非常热爱这座城市,可3年前,他还是选择了离开。告别巴黎后,艾格来到伦敦,他说在伦敦,有许多人找他创作墙体画,而在巴黎,要搅到一笔活儿,需要等上几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有位专家对这类现象如此解读:伦敦每天在变,而巴黎不是。一座不变的城市,肯定不需要墙体绘画艺术家。

的确,巴黎老城近百年来,几乎没有大的变动,城区保留了大量的老房子、老街区、老店面。雨果小说《巴黎圣母院》中描写的一些物件,在圣母院中仍然可以找到。如果这一切搬到中国去试试,不要说百年前的建筑物,即使是几十年前的建筑物,许多都在大规模的拆迁工程中消失殆尽。而巴黎老城,在1845年之后,历经100多年,几乎没有大的变动。香榭丽舍大街、卢浮宫,这些几百年以前的建筑物,像一座“中世纪城市博物馆”,人们在那里感受到的是“历史记忆”的厚重。这些都是文化自信的表现,一座没有自信的城市,不可能在现代的潮流中把这些老古董保留下来。

大规模的旧城改造看似与时俱进,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中国的许多城市觉得保留老街区难以跟上时代步伐,于是纷纷推倒造起高楼大厦,营造那种很现代、很时尚的都市,而完全丢掉了自己的个性。巴黎的自信让人肃然起敬。几十年前,在巴黎的旧城区中,建成了蒙巴拿斯大楼。大楼完工后,市民十分愤怒,因为

这座高达数十层的大厦,与周边的环境怎么也协调不起来,色彩、相貌、高度都完全不协调。本来巴黎还有改造老城区的想法,但在市民如潮的批评声中,巴黎再也没有了动老城区的念头,最后把新区建到老城区外面去了。法国全国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法国老房子价格在1998年至2004年间上涨了70%,而同期法国居民收入只增加了24%。该调查显示,巴黎的老房子房价飙升尤其快,6年间上涨了83%。而这一切,在中国的城市中是不可想象的,老房子升值率是不高的。自信是一个人站立起来的支点,自信也是一座城市矗立起来的支点。一个人没有了自信,将一事无成。而一座城市没有了自信,将会失去个性。我们的城市经历了数千年华夏文明的熏陶,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人文精神,这是我们的城市充满自信的源泉,但如何将这种自信传承下去,或许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道考题。



头颅与灵魂

王兆贵

到德国的斯图加特,不能不去看席勒,因为这是他的故乡。席勒虽然只活了45岁,他身后留下的文化遗产却弥足珍贵,人所共知的《强盗》、《阴谋与爱情》、《威廉·退尔》、《欢乐颂》等,均出自席勒的手笔。我在年轻时曾看过他的《阴谋与爱情》。这部名剧的人物,形象而又生动;语言,优雅而又犀利。“即使品穿着褴褛衣裳,也应该受到尊敬”,这句经典台词,至今记忆犹新。

按理说,要拜谒这位文化前辈,应该去他的墓地,由于魏玛不在我们的行程范围之内,只好作罢。我们来到席勒广场时,灰蒙蒙的天空就像席勒雕像的表情一样,阴郁而又凝重。选了半天角度,也未能拍出一张色调清晰的照片。好在这尊

雕像的目光朝向下方,使我们能够看清他的面容。雕塑上的席勒侧身而立,抓拢风衣的右手紧贴胸前,捏住书本的左手自然下垂,幽幽的眼神,似乎在思索一个萦绕在心头的问题,又似乎有些怅然若失。

席勒去世后的一个夜晚,被草草混葬在大众墓穴里,没有牧师的祈祷,也没有墓碑。在那动荡的岁月里,席勒的遗骨先后转移过3次。当战乱结束,人们打开他的棺木时,却发现里边竟然有两颗头骨。直到今天人们都不敢肯定,究竟那颗头骨是席勒的。波恩市的考古学家已经从当地公墓中挖掘出了席勒妻子夏洛特和他们第二个儿子威廉的遗骨,德国和奥地利的考古学家将对这些遗骸进行DNA检测,再将检测结果和两颗头骨的DNA进行比较,希望能一举解开真假头骨之谜。

其实,究竟哪一颗才是席勒的头颅并不重要。墓地也好,遗体也好,雕像也好,这些都是留给后人祭奠与缅怀的仪仗和表象,真正令人景仰的并不是大师埋在地下的枯骨,而是他留给世人的不朽文化遗产,是那颗平凡的头颅升华而出的高贵灵魂。